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史记

徐占权 主编

雷光鸿 姜为民 臧运祜 副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史记

主 编：徐占权

撰稿人：雷光鸿 姜为民

臧运祜 徐占权

军事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史记/徐占权主编.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9

ISBN 7-80021-980-1

I. 中… II. 徐… III. 中国工农红军五次反围剿—军事史 IV. E297.2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91 北京海淀区青龙桥)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12.125印张 303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00册

定价:18.50元



1933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八县在田会议上作报告。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在瑞金合影。(右起)王稼祥、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1933年12月28日,(左起)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在建宁县合影。

中華工農兵檢閱蘇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檢閱紅軍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檢閱紅軍。



中央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中的工農紅軍一部。



1931年红四方面军围攻黄安城时使用过的飞机“列一”号。



在湘鄂川黔苏区的红军(红二方面军前身)一部。

前 言

中国工农红军反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军事“围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较量。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的连续“围剿”，创建和扩展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和发展了革命力量，造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格局，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是大革命失败所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人民和革命武装，首先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随后，又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数百次武装起义，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新时期。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缺乏经验，一开始仍然照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夺取全国政权的经验，把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企图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再向农村发展。结果，使多数起

义武装遭到失败，少数起义武装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入反革命统治力量薄弱，革命较有基础的农村地区，得以生存和发展。这一事实，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是首先认识这个规律，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提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主要代表。

1927年9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确定的暴动计划，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进攻长沙。当部队进攻受挫后，他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已经开始退潮的情况下，攻占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在长沙周围的平江、浏阳一带也不宜停留。于是，他毅然放弃进攻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革命较有基础的井冈山地区进军，并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继续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以井冈山为榜样，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乘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之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至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由零星的起义武装发展到10多个军共7万余人，地方武装3万余人的武装力量。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及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等省100多个县境，其中赣南苏区（后与闽西苏区合并为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赣东北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特别是中央苏区，在当时是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红军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苏区。此外，在广东东江、琼崖（今属海南省），江苏苏中，四川东部，陕西北部等

地活动的红军还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在苏区内，红军和游击队普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武装，进行了土地革命。这些苏区和游击区，成为红军和游击队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结束后，即开始部署向各苏区和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此，反革命的进攻由过去一省或几省地方军阀组织的“进剿”、“会剿”，转入了由蒋介石国民党统一组织指挥或亲自组织指挥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围剿”。“围剿”一次比一次更激烈、更残酷、规模更大。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苏区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

但是，英雄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无所畏惧的。他们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徐向前、方志敏、刘志丹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的领导、指挥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从1930年10月到1935年11月，连续进行了数十次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大致经历了3个艰难曲折的斗争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12月。1930年8月，红3军团占领长沙后，蒋介石即命其“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着手筹划对湖南、湖北、江西省境内各部红军的“围剿”。同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一面委派豫鄂皖边区、豫陕边区、江苏、湘鄂赣边区、湘鄂川边区、江西、赣西、赣南、赣北、福建、鄂东、鄂南、鄂北、豫东等“绥靖区”的督办、司令或总指挥；另一面又迅速将其主要兵力转向红军和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并把重点置于中央苏区，企图在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摧毁苏区。红军为适应战争的发展，先后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一级的正规兵团，并逐步实行由以游击战争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同时，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连打破了国民党军

的3次大规模“围剿”，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正式形成。与此同时，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的红军，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系列反“围剿”的胜利，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这一阶段，红军累计歼灭国民党军20万人，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5万人，基本上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基本形成，为尔后的反“围剿”作战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1932年初至1934年底。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中日民族矛盾开始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团结御侮，抗日救亡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却违背全民族的意志，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于1932年5月又向各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并把重点首先置于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尔后转移兵力，全力“围剿”中央苏区。这一阶段，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加紧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军主力分别退出苏区，转移到川陕和黔东地区开展斗争，创建新苏区；琼崖苏区的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独立师大部损失，余部转入母瑞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红25军进行了七里坪战役，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在此期间，中央苏区进行的6次进攻战役，除漳州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外，其他战役都未达到预期目的，特别是赣州战役，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第四次反“围剿”虽然取得了胜利，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3个师，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但是，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全面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并被斗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承认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地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兵团和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

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而是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主张单纯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他们把当时红军正当的游击战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主张“进攻路线”，反对“诱敌深入”；主张阵地战，反对运动战；主张战略速决战、战役战斗持久战，反对战略持久战、战役战斗速决战；主张“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分兵把口”、“全线抵御”、“短促突击”等，同敌人拼消耗，反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从而，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之久，最终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于1934年10月举行战略转移。其他苏区的红军也相继退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至此，长江南北大部苏区陆续沦于国民党军之手，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也先后实行战略转变，分散开展游击战争。这一阶段，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连续取得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使川陕苏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部队的军政素质进一步提高。

第三阶段，从1935年1月到11月。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不仅为胜利完成长征，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提供了根本保证，而且使红军反“围剿”斗争出现了转机。诸如红2军团、6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的反“围剿”胜利，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两次反“围剿”胜利，特别是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会同第15军团，于11月在陕西所取得的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歼敌1个师另1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毛泽东曾指出：“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又指出：“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史，是中国革命战争史的重要方面。回顾红军的反“围剿”战斗历程，总结反“围剿”的历史经验，对于了解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等，都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目 录

前言	(1)
一、1930年夏秋形势，红军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 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1)
1930年夏秋形势和红军的整编	(1)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和红军 战略转变的开始实施	(5)
二、中央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12)
第一次反“围剿”	(12)
第二次反“围剿”	(24)
第三次反“围剿”	(35)
红军的作战原则	(46)
宁都起义	(52)
三、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	(58)
红2军团的南征，红3军的转战	(58)
洪湖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64)
红3军返回洪湖苏区后的斗争，湘鄂西苏区的 巩固与扩大	(73)
四、鄂豫皖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78)
第一次反“围剿”	(78)
第二次反“围剿”	(85)
红四方面军四次进攻战役的实施，国民党军 第三次“围剿”计划的破产	(91)
五、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的反“围剿”	(99)

湘赣苏区的反“围剿”	(99)
湘鄂赣苏区的反“围剿”	(105)
赣东北苏区的反“围剿”	(108)
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中央苏区的六次	
进攻战役	(113)
1931 年秋后的形势	(113)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117)
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的召开，中央苏区六次	
进攻战役的实施	(122)
七、鄂豫皖、湘鄂西、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	(144)
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	(144)
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	(153)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	(166)
八、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	(181)
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准备，中央苏区反	
“围剿”前的情况	(181)
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开始，红军反“围剿”	
作战初期受挫	(191)
中共临时中央处理“福建事变”中的错误和红军	
的作战行动	(200)
国民党军重新发起进攻，红军反“围剿”作战失利	(211)
国民党军向苏区中心的进攻，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的最终失败	(220)
九、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琼崖苏区的反“围剿”	(229)
闽浙赣苏区的反“围剿”	(229)
湘赣苏区的反“围剿”	(234)
湘鄂赣苏区的反“围剿”	(244)
琼崖苏区的反“围剿”	(248)
十、川陕苏区的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	(251)

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创建川陕苏区	(251)
反三路围攻	(254)
红四方面军发起仪南、营渠、宣达战役	(259)
反六路围攻	(264)
十一、湘鄂川黔苏区的反“围剿”	(273)
红3军转战湘鄂川黔边，创建黔东苏区	(273)
湘西攻势的开展，湘鄂川黔苏区的形成	(276)
湘鄂川黔苏区的反“围剿”	(282)
十二、鄂豫皖苏区的反“清剿”、反“围剿”和鄂豫陕	
苏区的反“围剿”	(292)
鄂豫皖苏区的反“清剿”	(292)
鄂豫皖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	(297)
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	(306)
鄂豫陕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	(309)
十三、陕甘苏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314)
陕甘苏区的创建	(314)
第一次反“围剿”	(316)
第二次反“围剿”	(318)
第三次反“围剿”	(320)
十四、反“围剿”期间的军队建设	(328)
调整部队编制，适应战争需要	(328)
加强军政训练，提高部队素质	(335)
兴办红军学校，培养建军人才	(340)
加强后勤建设，保障部队供给	(345)
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发挥人民武装的整体效能	(348)
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官兵阶级觉悟	(351)
结束语	(358)
后记	(375)

一、1930年夏秋の形势，红军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1930年夏秋の形势和红军的整编

1930年夏秋，正当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蓬勃发展之时，国外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对革命有利的变化。

在国际上，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国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迅速增长。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并未临近崩溃，也没有随之而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

在国内，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政治上，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于1930年5月同冯玉祥、阎锡山商定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达成“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交易。随后，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各主要反蒋派都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又成立了与南京政府相对抗的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国民党新军阀为了争夺中央领导权和抢占更多的地盘，从1930年5月开始，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余万。主战场在河南、山东两省，但受其影响的地区达10余省，战线绵延千里，历时半年之久，双方死伤逾30万人，军费开支达5亿元，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难以数计的损失。在经济上，连年不断的新军阀混战，造成工业停滞，农业减产，交通破